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Do

总记
登号

BK 157829

乐苑谈往

【廖辅叔文集】

廖崇向 编
华乐出版社

yuè yuán tán wǎng

乐苑

【廖辅叔文集】

乐苑谈往

廖崇向 编
华乐出版社

中央音乐学院

图书馆

杨惠林

廖辅叔
九七
三
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苑谈往: 廖辅叔文集/廖崇向编. —北京: 华乐出版社, 1996. 11

ISBN 7-80129-000-3

I. 乐… II. 廖… III. 音乐-文集 N.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2501 号

责任编辑: 许在扬(特约) 王 华

封面设计: 步 功

出版发行/华乐出版社(北京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千文字/300 印张/13

版次/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45 册

定价: 25.00 元

题 记

记得从前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人向我索阅我过去的一篇文章，我一面帮他找，一面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编印文集，所以发表的东西总是随便乱放，恐怕不易找到。结果真的是令他失望而去。

既然说不打算编印文集，那为什么现在又印起来了呢？那是由于一些热心朋友的怂恿。他们认为我那些关于近代音乐家的论述，多出自亲见亲闻，实为一代信史。那些历史上的人和事，也是一般很少涉及的，都值得好好收集，不能让它随便散失。我也就如齐白石生前说过的那样，老人善随人意。

先是《音乐研究》编辑部的黄大岗同志，把登载我文章的刊物拿去复印；随后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张静蔚和中央音乐学院的王凤岐两位同志走上门来，正式提出出版计划；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个音乐学博士陶亚兵为本书编制目录，再由中央音乐学院的孔庆先和方承国两位同志，在王次炤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奔走联系，几经周折，终于决定由华乐出版社出版。至于编纂全书，翻检核校始终而总其成的，则是吾家崇向。现在出书已经计日可待，谨在此对热心诸君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所收文章，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写成的。经过拨乱反正，虽然获得第二次的解放，仍然心有余悸。所以拿起笔来，积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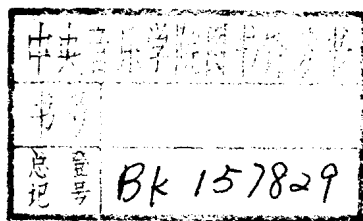
未忘，还是高其姿态，批判先行，以致对素所尊敬的良师益友诸多失敬。每一念及，惭惶无地。为了证明在下并非是一贯正确，所辑文章一律保持原样，不予改动。又因为应付约稿，同一个人先后写了不同的几篇，内容自然不免重复，但也有可以互相补充的地方，所以除删落少量重复内容外，也尽可能保持原样，以存其真。

另外一点，我的藏书由于“抄家”丧失殆尽，参考资料缺乏，加之疏于考究；文中颇有失误，例如《萧友梅生平小考若干则》里面关于萧友梅藏匿孙中山先生的时间就是说错了的，这一点在《萧友梅传》里面已予改正，这里依旧保持原样，不予改正，以志吾过。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廖辅叔于北京，虚岁九十

0756/30



目 录

题 记

蔡元培先生与音乐教育	(1)
回忆萧友梅先生	(5)
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先生	(10)
萧友梅生平小考若干则	(25)
萧友梅先生传略	(29)
李叔同的实心眼及其他	(36)
略谈青主的生平	(42)
纪念青主百岁冥诞	(49)
悬念琵琶塚——记琵琶大师朱英	(57)
千秋绝业 一代宗师——杨荫浏先生十年祭	(62)
语言学家赵元任和他的音乐创作——在赵元任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	(67)
近代中国第一个合唱女指挥周淑安	(77)
忆黄自先生	(82)
千古文章未尽才——我所认识的黄自	(87)
记王光祈先生	(109)
独上昆仑发巨声——王光祈诗如其人	(117)

悼念萧淑娴大姐	(126)
应尚能先生二三事	(131)
中郎有女慰泉台——吊吴伯超	(136)
追怀田鹤	(141)
记作曲家刘雪庵	(148)
大才未展 懿范长存——哀悼姚锦新教授	(155)
悼老校友李献敏	(161)
谈老一代的歌词作家	(165)
贺老琵琶定场屋	(172)
梅柏器其人	(177)
查哈罗夫其人	(183)
关于齐尔品	(189)
戈尔施密特纪念	(194)
王韬与西洋音乐	(200)
刘师培论音乐亦有新意	(209)
余事也具有开拓性——瞿秋白在音乐方面的点滴资料	(217)
蔡元培遇事想到音乐	(222)
鲁迅·音乐·萧友梅	(228)
青主谈艺	(233)
青主遗事点滴	(237)
从老黄埔到新黄埔——青主在广东	(239)
黄自文化生活点滴	(243)
从诗人到音乐学家——纪念王光祈先生诞生九十周年	(246)
因谈文化修养而想起陈田鹤	(250)
苏曼殊的“音乐因缘”	(253)
徐志摩与音乐	(259)

读《留美三乐人》书后	(264)
国歌琐谈	(269)
与音乐有缘的外交官——曾纪泽	(275)
乾隆宫廷音乐中的洋玩意	(279)
近代中国人笔下最早的西洋音乐剧作	(285)
近代中国人最初接触西洋音乐的反应	(289)
贝多芬在中国	(302)
话说“音专”	(308)
音院音专的悲欢离合	(317)
记乐艺社	(320)
谈音乐艺文社	(327)
从苦难到欢乐——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往事琐记	(332)
谈中国的“第一个”什么之类	(340)
歌德与梁启超	(345)
刘半农与赵元任	(349)
论《教我如何不想他》的“他”字	(353)
中国近代最早收入大量音乐条目的百科词典	(358)
《萧友梅音乐文集》序	(363)
重印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赘言	(368)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序	(373)
《中国箫笛》序	(375)
《中西音乐交流史稿》序	(378)
[附录]	
一、惭愧的回顾	廖辅叔(381)
二、廖辅叔主要著述目录	廖崇向辑(396)
后记	(408)

蔡元培先生与音乐教育

蔡元培先生(1868—1940)逝世 40 周年,中华书局及时出版了高平叔编著的《蔡元培年谱》。这本书取材精审,持论平允,为研究蔡先生的生平学行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真称得上是一本好书。但是看过之后,觉得其中也不无小失。例如 1927 年 12 月这一条说:“主持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筹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此项提案经大学院采纳,创设国立西湖艺术院,初办时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院长。后改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对于这段记载,我有点不明白,我所知道的是杭州艺术院与上海音乐院是在蔡先生赞同之后同时成立的。上海音乐院成立于 1927 年 11 月 27 日,蔡先生兼任院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不久,蔡先生即辞去院长职务,由萧友梅代理院长,1929 年改为音乐专科学校,萧先生任校长。杭州艺术院也同时改为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林风眠。当时的《音乐院一览》第一次印出的蔡先生像称为“院长”。改为音专之后,《一览》照旧有蔡先生的照片印在前面,称呼则改为“本校创办人”。这固然有借重蔡先生的大名来提高学校的声价的意思,但是饮水思源,蔡先生对音乐教育的关心与维护,的确是值得我们怀念的。现在这一件事没有记入《年谱》,总觉得有点缺陷似的。

许德珩同志在蔡先生逝世 4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里面提到：“蔡先生主张‘教育救国’、‘科学救国’，送派优秀青年十余人，赴欧美深造，后来大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从事教育科学事业。”这一批优秀青年之中，就有去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专攻作曲理论，返国后即以音乐作为终身事业的上海音专校长萧友梅。

蔡先生的教育方针是除了德育、智育、体育之外，还要加上美育。他在法国给当时的华工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没有派出军队，只是派出工人作为参战的象征）上课，讲到文化修养的时候，除了历史、地理、戏剧、诗歌之外，也提到图画与音乐。他跟一个比利时人学法语，也说到这位老师“长于音乐，欲改五线谱为三线谱”。这种琐事在一般人看来，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他却在自写年谱中还要加上这一笔，无疑也是他对音乐颇感兴趣的表现。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蔡先生在北大推动了各种文艺研究的组织，音乐研究会也与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一样成立了。1919 年 11 月 17 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蔡先生在音乐研究会的演说词，指出“音乐为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高尚乐理，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长，补中乐之缺点，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此外，他经常到各校演讲，宣扬美育的重要，也总是绘画与音乐并举，而且指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图书馆、研究所、博物院、展览会、音乐会、戏剧、印刷品都很重要”。这样的议论出自六十年前，今天听了还使人感到亲切。

但是音乐研究会虽曰研究，究竟有点近于暗中摸索。1920 年萧友梅由德返国，音乐研究会才算有了懂行的导师。蔡先生接受萧友梅的建议，改音乐研究会为音乐传习所，由萧友梅担任和声学 and 音乐史的讲授，并由校内研究扩大为对外开放，而且组织了小型

的管弦乐队，演奏欧洲古典音乐，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才第一次由中国人演出。

萧友梅的志愿是想在中国创立专业的音乐院。他在北京曾向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提出创办音乐院的计划，结果是大小计划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直到1927年，由于得到蔡先生的支持，萧友梅梦寐以求的音乐院才终于成为现实。

蔡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之后，对音乐院（音专）仍然是继续关心。就我所知，萧先生每逢音专有什么重大措施，都先向蔡先生汇报。蔡先生对萧先生的汇报总是耐心倾听，同意的就频频点头，不明白的就及时发问，听懂了就相视而笑，表示赞赏。他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一点架子。

音乐院建院之初，南京政府曾经批准了六万元作为音乐院基本建设的经费。但是这笔款子始终没有发下来。萧友梅没有办法，只好向社会发起募捐，以便凑到一笔建筑自己校舍的经费。募捐启事当然又是蔡先生领衔。后来音专江湾新校舍落成，蔡先生还在校园里种了一棵大松树，并在树前摄影留念。

也许有人会说，蔡先生对音专的关怀，只是由于他与萧友梅的个人关系。其实不然，他对艺术从来就有广泛的兴趣，同时包括音乐。他应郑振铎之请，为《世界文库》写了一篇序，说到各国文艺互相影响的时候，除了文学之外，他又举中国绘画可以在伦敦展览，得到欧洲人的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可以在上海演奏，引起中国人的共鸣为例证。

1936年王光祈病歿波恩，他在国内的朋友为他举行追悼会。说实在的，这一类的追悼会当时可不容易受到大人物的重视，更不用说亲自出席了。然而蔡先生来了，还发表了演说：指出中国人从来是重视音乐的，两千年前音乐已经列为六艺之一。德国人也最

重音乐,音乐理论著作尤为丰富。对这一门科学研究一番,很有益处;王光祈在德国研究音乐,并在波恩大学讲学,造诣甚深,壮年逝世,未展所长,实为一大损失;建议一是整理死者著作,二是后死者继续死者的工作,使之发扬光大。

今天,蔡先生所关心的音乐教育,已经真正的蓬勃发展了,这是可以告慰于蔡先生的。由于这些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论述蔡先生生平学行的,又未必对这方面多加注意,所以我谨就见闻所及,略为陈述如上。

(原载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1980年第1期)

回忆萧友梅先生

辛亥革命以来,像萧友梅先生那样把音乐教育当作安身立命的事业,而且始终如一,到死方休的,算起来人数并不多。同他一辈的人物,如李叔同,曾经是创作新歌曲的开山,到了“五·四”运动前一年,就已经在杭州虎跑寺做了和尚;王光祈,新文化运动以后研究中国律学和音乐史的专家,到了抗日战争前一年,就已经客死德国波恩。他们活动的时间都不及萧先生那么长,社会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盖棺论定,萧先生可真够得上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首屈一指的人物。当然,由于中国社会飞速的发展,到了后期他已经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是饮水思源,萧友梅还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听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中华民国史》将要为他立传,这篇回忆性质的小文章就算是萧传的参考资料吧。

香山萧家先前该是一个大族,我看过先生老家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座楼房,里面可以住上不少人,但是后来似乎中落了。所以萧先生留学日本的那段时期,在他考到留学生官费之前,要靠翻译来挣点生活费。那是这样的一种翻译:日本教师在那里讲课,他站在旁边跟着翻译。因为当时“大清帝国”的许多留学生,根本听不懂日本教师的话,必须花钱请一个翻译来传话。民国初年,他去德国留学,一开头就是官费生,生活应该富裕一些了。但是他的家庭不

同意他出国,因为他有维持家庭生活的责任。解决的办法是他留学之后,要把官费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寄回中国去补贴家用。因此他在德国留学时期生活总比一般留学生俭朴。听我的哥哥说,他当时是在修道院里面租用一个房间,房租比城市住房便宜,又可以安心读书。中国从前的读书人为了安心读书,常常是寄寓在庙宇里面的。想不到萧先生出洋留学,依然继承了这个传统。

1906年萧先生加入同盟会。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活动已经受到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的注意,随时有被追捕的危险,萧先生的住处因此成为同盟会的联络点。萧友梅是学音乐的,与政治可以说没有什么瓜葛,可以避开暗探的狗鼻子。据说孙中山先生与廖仲恺先生一班人开会的时候,萧先生实际上不可能像其他革命家那样指天划地,审时度势,于是萧先生就站开一边,抱弄廖先生的孩子,以便他们专心筹划革命大计。经过实践的考验,孙中山先生很欣赏萧先生的为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萧先生即被任命为总统秘书。他的书房里一直摆着一张孙中山亲笔题着“友梅先生惠存”的照片。

德国大学生有一种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习气,通称为“学院一刻钟”,意思是迟到一刻钟进入课堂不算迟到。我们的萧先生却利用这一时刻钟让教师当面修改他的作业。他那种爱惜时间的习惯是处处表现出来的。1916年他考取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打得难解难分,海陆交通都陷于断绝状态,他不能立即返回,于是又转到柏林大学听课,并在歌咏学社(Singakademie)研究合唱艺术。

要在旧中国推广音乐教育,萧先生具有善良的愿望,至于促使他的善良愿望得以实现的,则是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先生。早在1916年蔡先生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就在北大成立了

音乐研究会。但是真正谈得上发生相当社会影响，却是由于萧先生提议将音乐研究会改为音乐传习所之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这个管弦乐队，说寒碜是够寒碜的，全体成员只有 17 人，其中有些人还是从前海关总税务司遗留下来的，但总算是我国人自己组织的管弦乐队，而且向群众介绍了西洋的器乐曲，甚至于交响乐。有一次徐志摩给学生讲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认为学生“没有听过夜莺就是一个困难”，为了让学生得到一点对夜莺的实感，他建议大家去听萧友梅先生指挥的贝多芬的第六“沁芳南”（交响曲）。这在当时真可以算得是空谷足音呢。关于萧先生的作品的影响，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 1921 年中国留法学生因反对中法反动派互相勾结，损害中国留学生的合法权益，被法国反动军警逮捕的时候，陈毅同志在狱中高唱《卿云歌》，借以表示中国人独立不屈的气概。这首《卿云歌》的作者正是萧友梅。虽然这首歌被北洋政府选定为“国歌”以及其后出现的一些情况，使得对于这首歌的客观效果的评价成为一个较复杂的问题。但陈毅同志当时高唱这首歌曲是用作战斗的武器的，这说明这首作品有其积极的社会作用的一面。

萧先生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创作仅居次要的地位。他创作的旺盛时期是在 1920 年初到北京至他同时兼任北京几个大学音乐系主任的那几个年头。当时国内创作的新歌是很少的，为了教学需要，他往往是随写随教。1922 年他的《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先后出版，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新耳目的盛事。虽然这些歌曲，特别由于那陈旧以至俗滥的歌词，加以在作曲技术上也不无可议之处，今天大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如果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一看，这是将近 60 年前编印成册的新歌，而且想一想新文学运动初期，胡适的《尝试集》也曾经算是呱呱

叫的新诗,两相比较,似乎也不必求全责备了吧。至于他在教育方面最快意的一件事则是他经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音乐院。过去他虽然身兼数职,总不免是寄人篱下,甚至于引起别人的讨厌。实际上音乐这一门在当时的高等学校里面不过是附庸的附庸,有的称为图音系,有的称为音体系,有的还称为图工操唱。经过他的努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体科终于两科分立,然而究竟还不能说是理想的专业教育机关。只有开办了独立的音乐院,才可以放手去干。但是说起来可怜,堂堂音乐院一个经费只有三千元,一年之后,几经交涉,才增加到五千元,因此精打细算是做得相当彻底的,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教务主任加一个注册工作人员就是教务处。图书馆从采购、编目到出借,全由一个人包办,当然更没有文化书、乐谱、唱片的分工,同时还要向德国定购乐谱,兼管代售,还要抄乐谱。虽然是穷打算,说到精兵简政,倒也是值得参考参考的。

要办好音乐院——后来又改为音乐专科学校,需要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即教务主任。最初萧先生想延聘青主担任这个职务,不久,黄自从美国回来了,这才改变了主意。聘请黄自,还因为黄自与黄炎培的关系,遭到国民党一些人的反对,只是由于蔡元培的点头,才算定局。也可见他处理事情总是出于公心,与蔡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一致的。

音专五周年纪念刊编印过一张“学生家长职业比较图”,“商”的比例几乎占了一半,这显示出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特色,对发展音乐教育来说是不相适应的。相当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有些女学生,来学的目的并不是放在音乐事业上。萧先生曾经感慨地说,一个学生在音专上了几年学,领到一张证书,只是添了一份嫁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萧先生出了一个主意:发函各省教育厅,每省保

送音乐学生若干人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回原地方工作,以便促进各省音乐教育的发展。这样一来,“富丽堂皇”的高等音乐学府也有了自边远省份来到上海的“土包子”。当然,不经过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点点滴滴的改良决不能改变中国音乐教育的落后状态,更不能改变音乐教育的根本方针。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使先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对外不抵抗,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对内却借口国难,加强他的法西斯统治,派遣军训教官进入各学校。萧先生眼看他惨淡经营的学校有人插手进来了,他老先生还想抵挡一下,结果当然挡不住。最后他向国民党教育部打一个秘密报告,请求调走这个军训教官。这是我替他起草的唯一的密件。报告上去,一直没有下文。哪里会有下文的呢?这简直是“与虎谋皮”!

抗战期间汪精卫逃出重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听说也曾企图拉先生下水。因为我早已离开上海,说不出什么具体情况,只知道他始终在孤岛上维护着那所风雨飘摇的音专,一直到他逝世,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记得从前上海有一家自来水笔公司曾经约请各界名流用它的产品题字,并把这些笔迹汇印成册,证明它的金笔特别适用于写中国字。其中有一张是萧先生写的,写的是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作为近代中国辛勤创业的祖国的音乐教育家,他是体现了于谦这首诗的精神的。

(原载《人民音乐》1979年第5期)